

## 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存在」問題： 新時代、新可能與新學術

謝國雄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導 論

黃應貴的巨著《文明之路》三大卷探討了東埔布農人由 1895 年日本據台開始，歷經 1945 年以來的國府統治，再到二十一世紀的新自由主義橫行的變遷過程。作者分別以「文明化」、「現代化」以及「新自由主義化」來說明這三個時期主要的發展趨勢，並指出在這三個趨勢下，東埔社分別歷經了文化傳統之形塑、文化傳統之再創造，以及地方社會重組等三個過程，也就是由「透過各種不同的交換以及『大家都同意』的機制來運作的充滿共享之平等社會、以家及家所轉換的聚落為主要的社會生活單位、在資源有限下有能力者之間的競爭造成聚落不斷分裂與遷移」，轉變為「以聚落為中心，教會為核心的集體生活」，再變成「跨越聚落、以個人與自我為主的社會、透過意象凝聚聚落」。作者並指出這三個時期不同的時代精神，分別是：文明化下的競爭對立與集體對抗，現代化下的肯努力便有收穫，個人能力得以發揮，充滿希望，以及新自由主義下的個人自我發揮到極點所呈現的非理性之感情和感官力量與想像（卷二：210）。

立基在長期的民族誌之上，結合了歷史文獻，《文明之路》不僅試圖理解過去，更試圖面對現在與偵測未來的可能。本書企圖恢弘，成就斐然，特別是第二卷，可說是台灣原住民研究的經典之作。

綜觀這三卷巨著，可以發現現代國家（包含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黨政府）、資本主義（包含新自由主義）以及基督宗教是影響東埔社的三大結構力量，然而東埔布農人並非應聲而倒，而是立基在傳統的基本文化分類概念（如「人觀」、「空間」、「時間」、「物」等）積極因應這些結構力量，並創造出新的可能。本書以整體的觀點細緻而精彩地陳述了這個過程。

上述三種結構力量的進展相互糾結，不論從哪一種力量切入，最終都會與本書的核

心論證遭遇。底下擬從我比較熟悉的資本主義著手，進而討論新自由主義，最後則就本書關心的「存在」問題，分享我的經驗與心得。

## 現代化下的東埔：是整體社會的分化或是資本主義的進展？

作者描述的「資本主義化的經濟」（卷二：第四章），其實涉及了下面幾個面向。首先是資本主義成立的條件，如土地私有化與市場機制的形成。1969 年時，貨幣流通、勞力進入市場、市場供需律開始運作、依交易維生者的產生，市場經濟大體建立並被接納，布農人能在當地賺取維持生活所需的貨幣現金（卷二：68-69）。

其次，資本主義經濟捲入了在地的社會文化運作，如教會組成儲蓄合作社、生產互助隊以及農產品直接運送等來解決資金不足、勞力短缺，以及盤商壓榨等問題。這種以集體力量來因應資本主義問題是建立在原有聚落成員的共享關係及傳統「盡個人所能，貢獻於聚落」的人觀（卷二：77）。

第三、作者很清晰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後果：一是經濟作物的發展帶來貧富差距，貧困者發展出「異夢派」宗教運動來對抗（卷二：84-102）；二是茶葉的生產讓現代「經濟」類別浮現。

進入新世紀之後，東埔布農人更踩在時代的浪頭之上，進行溫室栽培，財政金融管理成為經濟過程重要的一環，如溫室栽培業者必須透過各種管道借貸資金來投資（卷三：247）。這些透過各種管道獲取必要的資金與新知識技術來從事新耕作的生產經營者，是東埔的新階級，他們不斷獲取新知識與新技術，發展出「不斷進步以致於讓人心生希望的生活方式」（卷三：248）。換言之，維生活動已經不再屬於「經濟」範疇，而是涉及了「生活方式」。

經濟的資本主義化是第二卷「現代化」下文化傳統再創造的一個主軸。經濟作物的引進帶來了農業商業化，茶的栽種則讓「經濟」範疇清楚地浮現而與其他社會生活領域劃分開來。整體而言，本卷分述了「政治」、「經濟」與「宗教」類別的浮現與分化。

換言之，**第二卷關注的焦點是東埔整體社會的分化，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進展**。更具體的說，第二卷「資本主義化的經濟」指的是：資本主義運作的條件（如土地私有化、市場機制成形）以及資本主義帶來的後果（貧富不均、「經濟」範疇的浮現），**但這些討論並未直接探討資本主義的核心運作，即勞資範疇的分化與浮現，以及勞資之間的生產**

**關係。**「經濟」類別的浮現一定是資本主義進入東埔的先聲，也可能是其效應，但並非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軸，必須將「經濟」類別的浮現與資本主義的核心運作相連結，才能看出「經濟」範疇浮現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意涵。

其實，民族誌資料已經透露出了資本主義的核心運作在東埔社進展的訊息。從 1966 年開始種植蕃茄、香菇、木耳等經濟作物，主要的生產單位都是家（卷二：69，表 4-1 是以家作為單位來統計），即便到了本世紀的溫室栽培，也是以家為主要的生產單位，如溫室種植者 A 的收入與支出中，並沒有工資項目（卷三：29）。換言之，家戶是執行經濟作物與溫室栽培的生產單位，大部分並未聘僱工人，其運作邏輯不同於聘用薪資工人的典型資本主義企業。即便有些單位可能會擴大再投資（如溫室種植者 A），但這種再投資的意義與性質也不同於運用薪資勞動者來擴大利潤的典型資本主義企業。再者，即便是在最接近資本主義「企業」的製茶廠，其實也是漢人與布農人合夥（前者提供資金、技術，後者提供土地、勞力，所得扣除資方的成本後，二者均分，卷二：111），並非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所以，在什麼意義下，這些經濟活動已經資本主義化呢？

這個問題得從資本主義的核心運作來考察，即上面所提及的勞資範疇的浮現與分化，以及勞資之間的生產關係。就勞資範疇的浮現與分化而言，首先要探討的就是**勞動力商品化**。上面的民族誌資料指出勞動力商品化的複雜樣態，一是東埔布農人前往平地當薪資工人，二是前往平地當薪資工人賺取較高的工資，自己再以較低的薪資另請當地工人在家代為耕作（卷二：68），三是生產互助隊的原則雖是換工，但參加者仍然要將一半的工資奉獻給教會（卷二：73），四則是茶廠中布農人提供勞動力，但並非做為薪資工人，而是作為合夥者。

勞資範疇的浮現與分化涉及的第二個議題是**資本的進入**，東埔的例子也呈現了多種樣態，其一是漢人將資本帶入東埔，設立製茶廠（卷二：73），二是本世紀以來的溫室栽培者透過各種管道向外籌募資金（卷三：33）。

最後，勞資範疇的浮現與分化則涉及了**不同生產模式的連屬**（articul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上述生產單位是家戶，並未經常地雇用薪資勞動，從而具有家戶作為生產單位在勞動力運用、資金籌集等特有的邏輯與限制。也就是說，這些家戶為主的生產單位現在因為生產經濟作物（商品）而成為資本主義體系的一環，而不是透過薪資勞動。

雖說資本主義的核心邏輯十分清晰（「勞動力商品化」以及「運用薪資勞動來創造利潤」），但其呈現樣態卻相當多樣而複雜，只有正視這些呈現樣態，才能增進我們對資

本主義的理解。

勞資範疇的浮現與分化之後，接著就必須討論勞資之間的生產關係，也就是是有關**勞動力如何在勞動過程被運用來創造利潤的過程**，第二卷及第三卷並未對此多加著墨。但細緻探究這個過程以及上述有關勞資範疇的浮現與分化，是《文明之路》最有可能對台灣資本主義的研究做出獨特貢獻之處。柬埔寨農人如何理解與接受「人的勞動力可以買賣」、「人的勞動成果為什麼可以與生產者切割」、「在實際的勞動過程中他們如何貢獻出勞動」，以及「勞動成果要如何分配？」柬埔寨農人的研究最有潛力回答這些問題，因為相較於商品化已經十分普及與深入的台灣漢人，他們的人觀十分獨特（如相對的對等交換，而不是絕對的對等交換），最能凸顯他們與資本主義邂逅的特色，從而可以對資本主義在柬埔寨的進程做出原創性的理解，進而對柬埔寨與台灣社會如何與資本主義的連屬、乃至於台灣資本主義的特徵做出獨特的貢獻，但其中的關鍵是要確實掌握到資本主義的核心運作與其呈現樣態。

要言之，第二卷採取了整體的觀點，分述了「政治」、「經濟」與「宗教」範疇的浮現與分化，有助於理解資本主義在柬埔寨的發展。但若要更準確地理解資本主義的發展，則必須探討資本主義的核心運作在柬埔寨複雜的呈現樣態，以及布農人對這些運作的主觀理解。

## 「新自由主義」：無遠弗屆？

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在 1980 年代末期以後的展現，因此，本書第三卷的標題是「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這個標題意味著：

1. 新自由主義與地方社會的指涉不同。
2. 探討的重點是新自由主義對地方社會的**影響**，第三卷清楚地指出：新自由主義對柬埔寨布農聚落的影響深遠，不論在經濟、政治、宗教與親屬等層面上，都發生了跨越聚落、個人化與心理化的現象。作者在聚落、經濟、政治、宗教與親屬的變遷上，提供了具體的民族誌資料，並以「個人化、心理化」來概念化這些變遷，展現了一貫而嚴謹的分析。

這裡有幾點值得商榷。首先，在將這些影響歸因於新自由主義之前，有必要準確地掌握「新自由主義」的**內涵**。「新自由主義」有各種指涉：政策（如英國與美國的去管

制、私營化、刪減社會福利)、制度(獨尊市場)、意識型態(強調市場提昇效率,讓個人有自我實現的機會,而忽略市場實際運作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以及文化(相信並尊重自主的個體的價值,並且努力實現之),本書在提及新自由主義時,宜明確地說明其準確的指涉,這樣才能評估作者的論證。

其次,新自由主義起源於英美,在**台灣的具體展現**又是如何?舉例而言,自1970年代以來,台灣一直被視為是「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也就是透過國家來導引廠商與市場的運作,藉以切入世界市場中的利基。這個與新自由主義不相容的發展型國家,如何與為何轉向新自由主義?所展現出來的新自由主義是否有特殊的面貌?

最後,本世紀以來柬埔寨布農地方社會的各種變遷**都是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嗎**?幾個例子值得深思。其一、造成方派系競逐的布農文化協進會個案中,國家介入地方社會的影響遠比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更為重要。其二、多重人觀來自新自由主義嗎?多重人觀包含了傳統人觀、現代國家中的公民觀與資本主義中追求最大利益的人觀,顯然就不是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退一步說,作者指出整合多重人觀的自我意識,確實與新自由主義中的強調個人責任的論點相容,但是相容並不意味著新自由主義帶來了自我意識的建構。其三是溫室栽培的例子,作者認為柬埔寨溫室栽培者廣泛借貸,財政金融管理成為經濟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因而認定這是新自由主義的展現(卷三:50, 247)。過去幾次金融風暴都被看成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災難,之所以如此,並非金融進入生產領域,而是金融脫離生產過程而自成一格,可以被操弄、被投機,不受國家的約束。因此,是否可以柬埔寨布農溫室栽培者運用融資投資生產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之例?此外,心理化過程中逐漸重要的情感與情緒,或者「另一層次的地方意識」作為凝聚的力量、存於心靈深處的「意象」,又與新自由主義有何關係呢?

與第一卷的「文明化」和第二卷的「現代化」一樣,第三卷的「新自由主義」是形塑柬埔寨布農聚落的「結構力量」。上述有關資本主義的多種呈現樣態與新自由主義的多重內涵、歷史脈絡與影響機制等問題,其實都在提醒我們:不能將「結構力量」視為給定(taken as given),而只探究「結構力量」所帶來的影響。以下舉出作者將結構力量視為給定的兩個例子:

不論是在教會正式儀式的變革,或創新儀式與新興教派的出現,乃至於轉教現象,我們都可以看到**因應**新自由主義發展所導致個人與自我得以發揮到極點,以致於整個宗教的變革有著明顯的個人化、心理化、乃至於多樣化趨勢(卷二:145)。

「在新自由主義的條件下，個人與自我發揮到了極點，使得個人非理性的慾望與情感得以解放，如嫉妒心、權力慾、厭惡與喜歡等，個人慾望與情緒才得以在政治的實際運作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卷三：249）。

這樣的做法可能會帶來不易被察覺的後果。學術上，是將有待證明的論點（新自由主義已滲透進東埔社會）當作預設，藉此來進行推論（如上面的兩個例子，「…因應新自由主義發展…」以及「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也就是所謂的 *petitio principii* 的謬誤。在實踐上，則是將新自由主義視為給定的結構力量，排除了行動者介入與改變結構力量的可能，因為行動者只能在給定的條件下被動地因應。為了避免將結構力量物化，我們必須直搗黃龍，探究這些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以及行動在打造呈現樣態中的角色（謝國雄 2013：413-459）。

將第二卷與第三卷並看，可以發現，作者的論點是由「動態的鑲嵌論」轉向「存在論的關懷」，是由資本主義的討論，轉向「生活是什麼？人是什麼？」等問題。

## 另一個層次的實在：「存在」的問題

綜合本書的三卷論點，可以看到作者宏大的企圖：確認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臨，因為另一個層次的實在已然浮現，因為當地人的關懷已經發生變化，由維生問題轉向「存在」問題，如：「在這個時代條件下，他們如何做一個他們自己想要做的人？」（卷二：211）、「人是什麼？我們的時代是什麼？」（卷三：255）、「當地布農人對不同工作的選擇賦予較多關乎個人生命意義與自我認同的主觀意義，呈現出截然不同於現代化時期的布農人將生產工作當成展現個人能力外，更是改善生活之經濟手段」（卷三：35）、「目的更不是在維生，而是在追求他自己，關心的是『存在』（being）的問題」（卷三：25）、「新階級不斷獲取新知識與新技術」而不斷進步以致於讓人心生希望的生活方式」（卷三：248）、「具有凝聚力量的意象存在於「心靈深處」等。

為了掌握與勾繪「存在」問題，這個新時代中的新實在，作者發展出「心理化」與「個人化」等概念。新世紀下東埔布農人的行為趨勢立基在明顯的個體與自我之獨立自主性上，其性質卻是由個人間的愛與情感所孕育而成為家不可或缺的部份，作者稱之為「心理化」（卷三：153）。相對於過去「家庭」個人生命史的主要支柱，新世紀下的東埔布農人則是以個人為存在的主軸，家庭只是一段插曲，個人是社會的主要單位，作者

稱之為「個人化」(卷三：152)。

要如何評估「藉著確認另一個層次的實在來確立一個新的時代已然來臨」的嘗試？如何有效再現是一個關鍵。所以，要問的問題是：**本書是否有效地再現了另一個層次的實在？**這得從兩個方面來考察，一是對民族誌資料的詮釋，二是概念化。

在資料的詮釋上，我想舉非常有趣、特別的「布農杯」排球比賽來說明。排球比賽出現在復活節、母親節、嬰兒節、聖誕節、訂婚、但沒有出在葬禮，是本世紀東埔布農人創新的活動。作者呈現的排球比賽是：

1. 教會提供獎品。
2. 所有願意參加的人可以參加（包括客人、非長老教會的平地漢人或者天主教徒）。
3. 依身高平均分成四組來循環比賽。
4. 比賽的規則十分獨特：
  - A 三局定勝負。
  - B 第一局每次雙方同時各開一個球。
  - C 第二局持球的那一方同時開兩個球。第一局與第二局只有兩球都贏才算贏一分，若僅贏一球則平手而不算得分。
  - D 若雙方勝負各一，第三局則回到正常打一個球的規則。
5. 比賽的實況
  - A 觀眾竭力加油打氣，圍觀民眾熱情投入彷彿置身比賽之中，甚至以達到歇斯底里境界。
  - B 場上比賽的人，在移動與接、殺球的動作中，處處可見身體奮力拼搏的力道，以及個人情緒毫無掩飾地流露，將現場已然高漲的情緒帶向另一波更為亢奮、狂野、歡鬧直逼雲霄的高潮（卷二：96）。
6. 比賽的結果
  - 1 最後所有參加的人都有獎，不同名次的獎品差別不大。有時，連旁觀加油者也能分得獎品（卷二：97）。

作者的詮釋：「這是透過身體體力大量耗費的過程來發洩挫折與不滿情緒的運動，以達到傳統布農祭儀的 *sinpakanasikal* 大家都滿意之境界」。(卷二：97)

這樣的詮釋值得進一步商榷。首先是**操作化的問題**。到底透過排球比賽所發洩的「挫折與不滿情緒」是什麼？「大家都滿意的境界」的指標又是什麼？作者到底聽到、看到

了什麼，讓他足以發現「挫折」、「不滿」以及打完排球賽後的「大家都滿意」的境界？其次是**資料的性質**。依照民族誌的陳述來看，作者一直在觀察排球比賽，但是挫折、不滿、滿意等情緒，是否可以由觀察中確認？作者是否在排球比賽後與報導人討論排球比賽對他們的意義？甚或，作者是否就親身下去參加一次排球比賽，「以身為度」，來揣摩那些作者所宣稱的「宣洩挫折、不滿與達到大家都滿意的境界」？

第三是**詮釋上的問題**。固然，排球比賽時捲入全聚落的熱絡氛圍，必然會像 *kula* 或者誇富宴一樣吸引田野工作者的眼睛，但這並非排球比賽的唯一焦點，例如他們的比賽規則就值得注意，為什麼要增加一顆球？為什麼第一局雙方各發一個球、第二局時持球一方同時發兩個球以及兩個球都贏時，才算得分？為什麼會發展出這個規則？

作者的回答是：

不少當地布農人…提到，過去他們從事商業化農業生產時，只要專心於耕作，便足以改善生活。然而，現在他們所要面對的，往往是各種紛雜的事物，有時事情過多難以排出優先順序而讓人毫無頭緒，有時事情同時出現而令人措手不及，人們越來越不容易單純專心地做好一件事情了。就如同從事經濟作物種植者，不僅要擔心價格的波動、耕種的時機與類別，更要擔心如何籌到耕種所需要的資金，還得考慮如何在眾多農產品包裝行中挑選對自己有益者，甚至還得擔心孩子的教育、家人的關係等（卷三：231-232）。

這確實對為什麼要多引入另一顆排球做出了詮釋，但上述的「要兼顧很多事情」的困境如何與排球比賽的新規則連結在一起？這需要進一步以民族誌證據來說明。可以追問的是：這與「宣洩挫折、不滿與達到大家都滿意的境界」有關嗎？與傳統的人觀與交換有關嗎？與新自由主義有關嗎？另一種異想天開、但與新自由主義更有關連的詮釋可能是：在新自由主義個人與自我發展到極致的情況下，必須增加一顆球，來開拓個人打排球的空間，以滿足個人化與心理化的需求！另一方面，第二顆球可能瓦解了只有一顆球所帶來的一體感，裂解出更多允許個人發揮的空間。這就涉及了民族誌資料與**主要的論證的關係**。新規則下的排球賽，與新自由主義的運作（獨尊市場、排除國家、強調個人）有何關係？作者的確試圖連結排球賽與心理化（情緒的、情感的經驗），但排球賽與個人化有何關係？

最後，完整的詮釋必須**面對異例**。排球比賽出現在復活節、母親節、嬰兒節、聖誕

節、訂婚、但沒有出在葬禮。如果排球賽是透過體力活動「宣洩挫折、不滿與達到大家都滿意的境界」，那麼喪禮必然也帶來挫折與不滿，為什麼獨獨喪禮沒有舉辦排球比賽？

有效再現另一個層次的實在涉及的另一個問題是**概念化**。作者用來捕捉另一個層次實在的概念是「心理化」（以及相關的「心理慣行」與「精神氣質」、「個人化」與「意象」。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評估概念化的工作。

首先，概念（「心理化」與「個人化」）是否適切地被資料所例證？請參考前述有關布農杯排球賽的評論。

其次，是否針對概念本身進行檢討？舉例而言，「心理化」指的是一個過程，那是由什麼演變到什麼呢？是由「制度」、「行為」、「理性」演變為以情感為主的狀態嗎？

第三，是在相關知識系譜上的定位。相較於其他有關情感與情緒等概念，「心理化」的特殊性何在？是否具有區辨力？例如，本書區辨了「現代家庭化」與「個人化、心理化」這兩個趨勢，並且試圖在各個個案中指出何者較為凸顯，進一步說明「心理化」是東埔個案的特徵，也是本研究的貢獻。但事實上，「現代家庭化」已經包含了「個人化」（社交的衰退與個人隱私的成立）與「心理化」（家庭成員家有強烈的感情紐帶）。

第四、「心理化」這個概念是否有獨特貢獻？它是否解決原來研究所未解決的難題？是否「吃掉」了其他的概念（即將其他的概念含納進來？）

第五、是否留意到概念與現實脈絡的互動？「心理化」是新自由主義下特有的現象，還是新自由主義之前即已存在，只是到了新自由主義之後更為凸顯，並且以特殊的樣態出現？這涉及了概念工具與現象間的複雜關係。是否有可能：新自由主義之前，心理化已經存在，只是當時沒有適切的概念工具來掌握，所以無法呈現這個面向。一旦發展出「心理化」這個概念工具，那麼新自由主義化之前的心理化現象就可以被呈現，新自由主義化後的心理化的特徵也可以因此而被呈現。

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如何有效再現「存在」問題。《「文明」之路》掌握到了現象的變遷，並且指出「存在」是另一個層次的實在的核心關懷。如果被研究者的「存在」問題已經為研究者敏銳地捕捉到，那麼研究者自身的「存在」問題是否也應該搬上檯面？研究者如何受到其終極關懷促動，擁抱了特定的認識論立場，選擇了特定的基本議題，並且以特定的技法來進行研究？**研究者的「生命與理論告白」**涉及了存在論、認識論、基本議題與技法，四者緊密連結，四位一體（謝國雄 2007）。

如果因為研究自身個人的生命與理論告白而體會到被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也有「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等相互連結的面向，那麼對於被研究者社會生活的勾繪將會出現更多的層次、因而更全面。如此一來，不僅研究者變得立體了，被研究者也變得立體了，二者的互動就更為立體了，另一個層次的實在將由此浮現。

作者確實進行了生命與理論告白。第二卷導論中提及作者個人對農業機械化的感受與發現「水田中的哲學家」的驚訝（卷二：3-5），及第三卷序言中提及 2000 年時台東縣永康村三個月內 15 個人自殺，以及作者與兒子的互動等皆是。確實，這是**促動**作者去探究網路與新自由主義所構成的新時代，但在書中，作者自身的存在經驗與關懷仍然隱身為背景，如果能將自身這種存在經驗全面且有系統地**整合**進實際的研究中，將可以開啟嶄新的視野，如發展出新的議題、新的認識論與新的研究技法。以「布農杯」排球賽為例，如果研究者關心的議題是身體的活動與隨之而來的情緒、感受與效應（宣洩了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緊張與挫折），那麼除了觀察或訪問之外，親身參加排賽或可以創造另一層次的資料，從而更細緻地掌握到此地的基本議題（情緒與感官經驗）。進一步，這種親身參與的存在經驗也可以回應終極關懷：「新自由主義下是否有出路？」

一如作者一再暗示新時代已經來臨，我們是否可以期待新學術也在形成之中？具體而言，新時代來臨了，新課題「存在」問題浮現了，新學術要如何面對這個新趨勢？下面是幾個不可迴避的問題（謝國雄 2013：255-264，459-467）：

1. 我們是否對於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各式各樣的「存在」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與系統的考察？我們是否能敏銳地區辨出「存在」問題浮現的各種時機與樣態？
2. 我們是否讓「存在」問題與社會科學中既有的基本議題進行細緻的切磋，從而凸顯「存在」問題特有的面向與性質？
3. 我們是否確立了「存在」問題是社會科學中新的基本議題？
4. 「存在」這個新的基本議題是否革新了我們對社會生活的提問，帶來了新的謎題、新的問題意識與新的視角？
5. 「存在」這個議題是否開啟了人類社會新的可能？
6. 面對擅長處理「存在」問題的哲學與文學，我們是否呈現了社會科學處理「存在」問題的獨特貢獻？

相較於本書作者「憂時憂民」、關懷未來發展方向的熱切，上述的問題看起來可能十分冷靜。說不定，就在一熱一冷之間，我們摸索到了面向未來的社會與學術的道路。

## 引用書目

謝國雄

- 2007 《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台北：群學。
- 2013 《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